

## book

## 劫富济贫与天下为公

——读庇古《福利经济学》

□冯维江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中说,“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至少在阅读庇古(A.C. Pigou)的《福利经济学》之时,我有类似的感受。

庇古是新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之教授职位的继承者,接替这个职位时,他刚刚进入而立之年。虽然后来其事业总处在曾经的助手凯恩斯的阴影之下,从名气看也许又比不上他在哈罗公学的同窗温斯顿·邱吉尔,但仅“庇古税”一项,就已经足以让他令名昭显、史册留芳了。

## 富人与穷人

庇古34岁时的成名作《福利经济学》(最初发表时名叫《财富与福利》)最富盛名也饱受争议的论点在于,他认为富人从收入中获得的效用比穷人少,因此国民所得由富人转移向穷人,能够增加经济福利。他甚至明确提出,富人所得的增加如果伴随着穷人所得的减少,即便货币衡量的社会总所得增加,社会整体的经济福利还是可能降低。

显然,庇古的经济福利与心理满足或效用直接相连。他的主要论据有二。第一,同样额度收入引起的满足程度在富人那里低和穷人那里高。朱门不妨让酒肉臭掉,寒门却往往因为少一两口米饭而致人饿死。第二,因为凡伯伦所谓的“摆阔性”因素,富人的心理满足主要是因为其收入的相对数量,而相对收入对于仅能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收入所起的作用较小。所以,只要所有富人的收入一起减少,他们的满足程度就不至显著降低,而用之于穷人却能获得经济福利的明显增加。

庇古的论点往往被简化为劫富济贫的政治主张,但实际上他本人的工作要细致得多。例如,他对穷人作了区分,认为在经济领域和体格领域都存在一定数量的无法医治者,当发现这些人时,能做的最重要事,是永远地使他们没有寄生在别人身上的机会,没有传布他们道德传染病的机会,和没有繁殖像他们

本人同样性格的下一代的机会。庇古的这个想法与俗语“救急不救穷”相合。当然,他也指出这部分人只是少数,而且不能放弃通过教育来挽救其中哪怕极少数人的希望。

罗宾斯等人对庇古的批评集中在他的效用福利观上,他们认为个人效用之间不可用数量来衡量比较,面对同样数量的收入变动,富人损失的效用小于穷人获得的效用,从实证的角度看是不能证明的,因此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的主张并无科学依据。卡尔多等人为“挽救”福利经济学,放弃了庇古边际效用基数论的立场,转而从序数效用的视角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最优条件,从而也就跳离了庇古所强调的国民所得之分配影响经济福利的观点。

抛开论证的技术细节不论,笔者认为从分配和产出两个方面来考察经济福利的增减,是庇古区别于亚当·斯密以及其他主要仅从产出角度考虑国家财富之损益的经济学家的主要特点,也是其最显著的优点。由叶航教授的介绍得知,华裔经济学家黄光有从基数效用的立场阐释“效率与公平”,这实际上反映了对经济福利之考察向庇古主张的分配立场的复归,虽然未及阅读黄光有的论著,但从情感上我乐于见到他的成功。

## 社会与私人

庇古对社会净边际产品和私人净边际产品的区分和分析也颇有大家风范,科斯对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问题的卓越研究便源出于此。

庇古认为,私人净边际产品与社会净边际产品相等才能实现国民所得最大化,但两者往往背离。在一些行业之中,社会净边际产品高于私人净边际产品,对这些行业的投入就会不足;而在那些社会净边际产品低于私人净边际产品的行业,又会出现损害社会整体福利的过度投入。据此庇古认为政府对那些存在负外部性的行为应予以干预,例如对环境污染物课以补偿性的税收,增加其私人边际成本以使其与社会边际成本相当(这样的环境税后来被称为“庇古税”),科斯则提出,这样的事情也毋需政府出面,只要产权明晰,私人完全可以自己搞定。实

际上,早在二十年代奈特(Knight, F. H.)就注意到了庇古理论之中“产权”的缺位。不过,依我之见,奈特、科斯等人似乎只是想取消庇古注意到的“外部性”和“市场失灵”问题,而将之化约为交易费用视域下的产权界定问题而已,实际并无损于庇古立论的逻辑。

本文无意也无法调解大家们的争议,仅抽出庇古书中用社会净边际产品和私人净边际产品的框架做出的若干精彩分析,以证其研究之精到。庇古尝言,彼时生产过程中流行的标准话和科学管理,是以牺牲社会净产品来提升私人净产品的。在严格的标准话制度下,谁都无法领先于他人或采取新的样式,除非整个行业这样做。这样做能够极大地扩大现有商品的生产,但却以不再获得更好的商品为代价。我国社会是较为典型的二元结构的社会,一些行业尚无合适的标准来保证质量促进效率,另一些行业又有体制僵化不利创新的危险,庇古的这个见解对于科学技术研发活动更有警示意义。

庇古还从“社会产品-私人产品”二元视角对马歇尔提出的“小企业的教育功能”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不同规模和性质的产业单位除生产之外,还具有培训身处其中的劳动者的功能。社会中各种规模的产业单位分布比较合理,不啻于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发掘和提升自身才能的阶梯。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产业如果为几个巨型联合体所控制,虽然它们的私人净产品能够实现最大化,但这样的后果是阻碍了更多拥有潜在才能的人经过“能力阶梯”不断培训企业家职能的机会。社会净产品因之不能最大。也就是说,对全社会而言,一个良好的经济组织生态,应该是不同规模和性质的企业共生的、多样性的形态。从我国的情况看,也就是要让“做大做强”和“做小做活”能够和平共处、并行不悖,只是鉴于各地开发区追求高投入、大项目的政策激励机制尚在,“大道不行杼于海”的状况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福利经济学》(上)(下)  
(英) A.C.庇古 著  
商务印书馆 2006年9月出版

■新书过眼

## 《小的是美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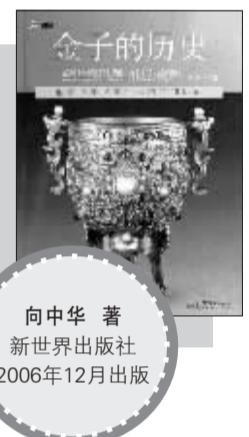


这是一本出版30多年之后还有人在不断地读,并从中获得启示的书,代表了经济学家的逆向思考:如何生活才是值得的与快乐的。20年前,汉译本初版时,国人对其论述的感受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在舒马赫眼中,西方世界引以为傲的经济结构,不外乎个人追求利润及进步,从而使人日益专业化,使机构成为庞然大物,带来经济的无效率,环境的污染、非人性的工作环境。他所提倡的中间技术为基础观念,为经济学带来了全新的思考方向。他认为,战后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道路发展经济失败了。新的发展道路应该以三个问题为中心:一是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创造财富最重要的来源,解决失业问题,以使所有人摆脱贫困

为中心;二是把发展作为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一种进化,从教育、组织、纪律等非物质问题入手;三是把发展重点放在农村,避免工业破坏农业、农业又报复工业的“相互毒化”。实现这样的发展要克服对大规模的迷信,强调小规模的优越性,这正是“小的是美好的”的含义。

## 《金子的历史》

锤炼中华民族性格的精神印记



金子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几乎一样古老。

一万两千多年前,自从人类发现和认识了金子,它就点燃了人类心中种种狂热情绪。不论把它看作是永恒的财富还是美丽而高贵的妆点,人类自此就开始了漫长的追逐金子的游戏。作为一种奢侈品,金子既是无用的,又是最有用的,它催生了审美和象征,而且各个阶层都有不一样的审美或象征符号。回眸中外历史,这东西作用最大的无外乎权贵者的金杖、死时的金面罩,金缕玉衣之类,另外就是宗教或类宗教圣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它作为日常用品在生活中的点缀……它的等级性、聚光性以及其他所衍射的五花八门的光泽,都可以从

持续的文明的范畴去获取解释。一部金子的文明史,也就是一种奢侈品的历史,一种玩物的历史,一种消费的历史,一门艺术与工艺的历史。

## 《历史的刀锋》

——剖析影响中国历史的11个关键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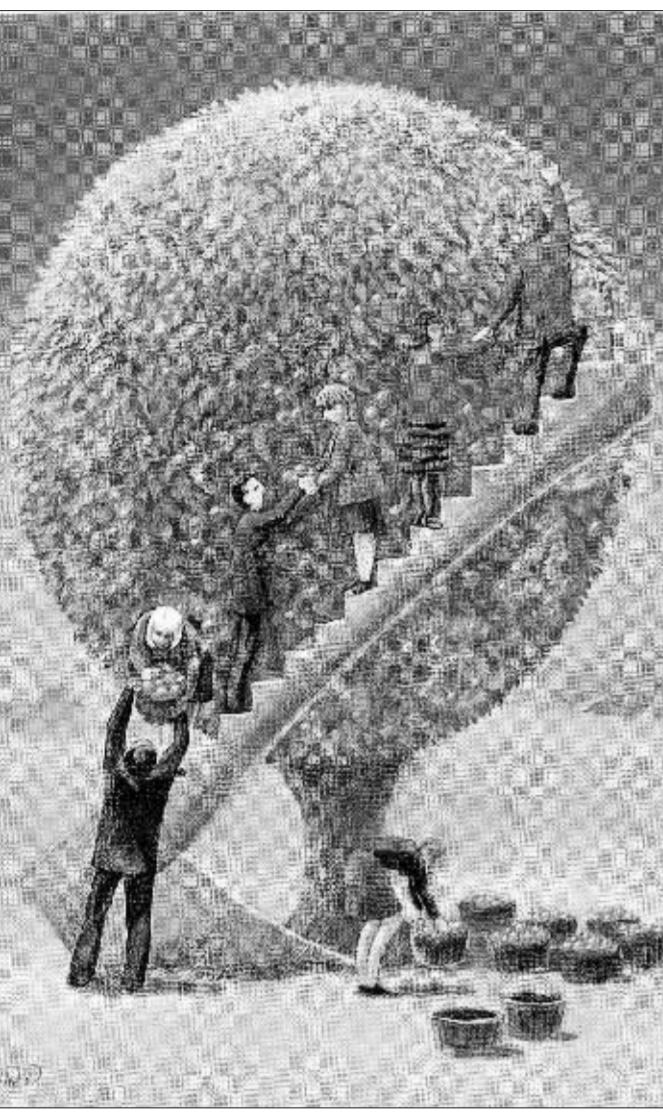
是谁拨动了历史的转盘?至少在中国,这是一道与人较劲的难题。本书给出的答案是人民(历史群体)与英雄(历史个体)。但在中国的所有正史中,人民的形象历来模糊不清,叱咤风云的几乎全是以“英雄”的帝王将相。能够进入作者视野的,就不能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周文王、吕不韦、董仲舒、曹操、拓跋宏、朱元璋、吴三桂这些“对中国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产生过大深刻影响”的历史个体。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拘泥”于这些历史个体本身,而是以他们为“载体”引发开来,以启蒙思想为参照,用今人的立场眼光来透视,析事于理,融理于事,一方而着眼于“英雄”的历史地位,

如周文王之于中国文化的开创,吕不韦之于秦王朝的建立,董仲舒之于中国思想的统一,拓跋宏之于民族的融合,吴三桂之于明亡清兴;另一方面,更关注隐匿在这些“英雄”行迹背后的历历史局限与思想启示。

## 《布莱尔夫妇》



作为成功的律师和女权主义者,切丽是英国第一位有高级职业的首相夫人,并且对丈夫的政治见解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丈夫执政后不久,她便悄悄地开始定期主持一系列会议,大臣们早已习惯于像多余人一样坐在那里,让她掌控一切。对于一个不断地因为公开任人唯亲及其总统制风格而备受指责与嘲笑首的而言,切丽参与政府的事宜始终特别有争议,更引出买房受贿等诸多风波。本书作者从政治、家庭、工作等方面,详细记述了布莱尔夫妇鲜为人知的生活,以及坎坷的政治风雨历程,尤其是布莱尔及其夫人生的多面性,透露了切丽为妻、为人母脆弱敏感、矛盾多变的一面。他们的过去与共同的理想,使他们成为了密不可分的独一无二的人物。身处政治风暴的中心,他们会继续紧密团结,排除周围的一切干扰,直至能重新组合去面对未来新一轮的挑战。毫无疑问,这样的挑战在未来的路途中将会有更多。



## 后互联网时代的偶像

□吴晓波



像这样的迷人传奇至今仍让许多人激动不已:1958年,31岁的牧师之子罗伯特·诺伊斯到硅谷的仙童公司上班,当时他只梦想着赚一双鞋子的钱,但十几年后,他永远地解决了鞋子问题,他创办的英特尔公司令他成为全美最富有的人之一;1984年,年仅19岁的迈克尔·戴尔对他的父母说:他不想再上学了,因为他发现了打败IBM的方法。然后戴尔创办了DELL公司,并让后者进入了20世纪最伟大公司之列……传奇所造就的财富英雄诺伊斯和戴尔成了无数青年的偶像,有多少年轻的心这样憧憬过:在某日清晨醒来,对自己父母说:“我不上学了,我要去打败DELL!”

但时光在流逝,一切也在改变。当我们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正在日益显现。正如机器工业的出现淘汰了手工制造的农业一样,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也让曾经辉煌无限的工业生产面临了危机,而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原先的传奇也在逐渐平凡。在金错刀著的这部《快品牌》中,上述传奇早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更新的传奇。“GAP、福特、柯达、英特尔、戴尔做梦也想不到他们会成为反面教材,而Google、eBay等新贵却以令人惊讶的速度站在了今天公司榜的顶端……”

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出生在上个世纪,由此对过去总存着难以消逝眷恋,但商业领域的竞争从不温情,它也永远只对现实有意义。对于今天很多的传统公司来说,我们现在只能在新的竞争领域的彼岸遥望它们的身影,它们走过的道路即使再有意义,也不再有借鉴价值,因为从根本上说,21世纪与20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尽管它们首尾相连。

事实上,今天我们面对的社会,这些特点已成不争的事实:20世纪充满常识,而21世纪无常识可言,一切会突然发生变化;社会每过两三个月,就会改头换面;技术革新不断出现,赶不上时代步伐的企业就会被淘汰,而更令人惊愕的是,改变不仅发生在企业层面,甚至还在某些产业里。由于我近期在整理《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1991年,柯达和富士在中国倾销胶卷。它们以远低于欧美市场价格的方式,来压低中国本土品牌的生存空间,此举

## 天堂与地狱仅一墙之隔



《迷失的华尔街》  
埃里克·班克斯 著  
彭立志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年10月出版

口徐瑾

它们大获全胜,很多中国本土品牌在那时消亡了。但到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一行为时,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好笑,今天谁还会感到好笑,今天谁还会用胶卷去拍照呢?你根本不用跟柯达和富士正面战斗,它们便会连同整个胶卷产业一同消亡!

这样的事实或许过于残酷,但却是最真实的。对于很多有志于在新世纪成长的品牌来说,看清这个时代的特点已经成为必修的课程。

今天,很多成立之初的企业与有着百年历史的企业相比,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这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达尔文进化论的精髓,就是鼓励不断进化、不断创新。而只有最好运用这种技巧的公司,才能在21世纪生存。但如何才能更好的运用呢?金错刀在《快品牌》中总结的经验是“快”,我认为这是基于这个社会的最深刻认识。

今天,任何一个品牌面对的都是一个8亿消费者的全球市场,这8亿人中,他们的学历、收入和生活方式都非常相似,他们的消费能力与国籍和所居住的国家无关,他们收入水平和消费性质相近,他们通过互联网在同一时间享受着同样的信息。因此,当面对这样一个市场时,传统的逐步开发式的品牌发展之路便已过时,因为当一个品牌若想先在某国取得成功,然后再打入海外市场,这时它会发现:他公司可能已经提供同样的商品与服务来抢占市场,而市场却只有一个。因此在今天,一个品牌如果不能将8亿人看成一个市场去快速开发,那么等待它的必然是恶性竞争的命运。

而做到这点后,更为困难的是又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让这8亿人都知道你的品牌,而这又不是仅靠广告或单一营销能解决的。而这就是金错刀在本书中想跟大家一起重点探讨的。

利字当头,无数英雄竟折腰。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中说到利润的诱惑作用:“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

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今天,美国顶级高管们的人均年收入早过了1000万美元,他们的收入不少是由自己公司的股票和股票期权构成。所以,上市公司高管如果通过非法手段装点公司业绩,既可以得到奖金,又可以让公司股价上涨,使得自己可以借机出让手中股票。每日面对动辄以千万为单位的机会,对比发现的小概率与低成本,有多少人能坐怀不乱?尽管华尔街公允地处理了大部分业务,但往往还是每一次过失丑闻的发生,都不同程度损害了华尔街的机制以及声誉。

华尔街业务广泛,但最基本业务主要可以归纳为募集资金、为企业提供咨询,为个人提供理财顾问、履行信托责任,以及管理风险。或许因为纽约的先驱开拓者是荷兰人,商业与冒险家气质始终是华尔街的精神内涵之一。华尔街保持核心业务的优势很多年——它在很多地方无可替代。如果一切运作良好,那么客户、银行、股东、监管等部门都是赢家。但事与愿违,往往由于意外失利以及明知故犯,由于无效的公司治理、管理失误、内部控制失效,以及外在监管审计的缺失,华尔街在过去,甚至现在,在募集资金、咨询建议和管理风险等方面都存在风险过大。

曾经效力华尔街多年的埃里克·班克斯队对此抱以忧虑。他认为平衡顾客、投资者、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雇员的利益的方式有二:协调一致以及保持理性。极端的薪酬往往扭曲人的取向,导致不正当行为,所以应该让天价薪酬回归现实。

2001年,《财富》500强排名第十七的蓝筹股公司安然倒闭,震惊全球,当时位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首的安达信因此消失。甚至有经济学家评价,2001年的“9·11”事件没有改变世界,安然之死却改变了世界。2004年,安然事件的主角们都已回到公众视野,前首席财务官被判处6年监禁,前首席执行官被判处24年又4个月徒刑,前首席会

计师被判入狱5年零6个月。乱市用重典,安然事件之后,美国监管机构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旨在提高企业财务透明,加大违规行为惩罚力度,尤其规定设立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对上市公司审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实行注册管理。但这无疑加重了管理成本,据统计,上市公司为此要多支出300多亿美元。面对以伦敦为代表的欧洲资本市场以及亚洲等新兴市场的竞争,为避免严厉监管将导致华尔街丧失竞争力,无奈之下,美国只好对《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做出修正。

华尔街如此重要,却又一向丑闻不断。金融巨鳄索罗斯认为美国文化金钱至上,要改革就要首先改变美国人的唯利是图。不幸的是,亚当·斯密几百年前宣告经济人因为理性,天生逐利这个观念在今天仍然适用,社会改良家指望华尔街诸公成为道德君子只能是空想。曾经是资深金融分析师的埃里克·班克斯,在探究了失控背后的制度因素后,认为如加深内外整顿和防御,华尔街应做得更好。自由市场机制下的金融市场,天生就有强烈投机倾向,每一项金融创新大都与逃避监管有关。没有华尔街的创新,金融必然将停滞不前,经济增长也会放缓。利益驱动下的资本流动,财富转移既为经济带来强大引擎,也无形中导致了一些扭曲的市场行为。如果华尔街的利益相关方多次受损,透支了投资者的信任,那么华尔街体系最终将走向崩溃。华尔街的规律在于,在很多次丑闻之后都能自我收敛,然后随着资金充裕,又故态重萌,但是始终表现了良好的适应能力。因而,重塑之路,除了在于加强内部控制之外,在外在整个监管和法律体系的调整也再所难免。

转型期的中国资本市场可以从中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呢?